

论政府介入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合理性

赵京¹, 王洁², 韦苇¹

(1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2 交通部 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因西部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特征以及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导致生态环境建设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 政府介入具有其理论基础。西部市场发育不足、生态建设主体素质较低以及生态建设工程的系统性和长期性等原因, 政府介入同时具有广泛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生态环境建设; 政府介入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5)03-0052-03

On rationalit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wester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ZHAO Jing¹, WANG Jie², WEI Wei¹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Academy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ublic attribute and externality of wester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scarcity of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s theoretical support. Because of the low-degree growth of western markets, low diathesis of principal part of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long period and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system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ts has broad realistic basis.

Key words: theoretic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山川秀美的西部生态环境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容忽视的特殊价值。西部的生态环境, 不但影响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 而且是中东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其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 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进行西部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 重建西部生态良性循环, 是中国政府振兴西部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和西部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和职能选择。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中, 政府职能的发挥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一、政府介入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基础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理论认为, 基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 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干预经济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中具有互补关系。只有二者有机结合, 才能有效促进社会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 使有限的资源创造出高质量无污染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劳务。其中, 社会总资源既包括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各种资源, 也包括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态资源。社会产品不仅包括物质产品, 而且还包括精神产品和生态产品。

收稿日期: 2005-06-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02JAZD790 040)

作者简介: 赵京(1969-), 男, 陕西临潼人,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 西安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市场机制具有自发调节作用。在一个国家中,正确运行(有效率)的市场是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减少环境退化和刺激可持续发展最有效的机制^[1]。但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运行中,市场价格机制不是万能的,“看不见的手”既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功能缺陷。

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经济主体以价格为信号追求自身最大效用和利润的一种激励体系^[2],可促进生态建设主体在技术、体制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生态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态建设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能及时做出灵活有效的反应,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资源分配的高效率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生态建设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生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功能缺陷和局限性。在生态环境及其建设方面,“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市场不能保持生态经济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协调。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经济均衡是一种通过分散决策进行事后调节实现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会产生生态经济系统的失衡。在退耕还林等生产周期较长的大型生态工程建设中,市场主体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生产要素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领域,导致生态资源配置和农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第二,环境信息的稀缺性与不对称性,会导致生态资源市场配置失效。由于人们对生态系统了解甚少,环境信息十分稀缺;而且由于信息的公共性和某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又容易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市场机制在环境问题往往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3]。

第三,市场机制无力组织与实现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增加一个人享用成本,而排除任何一个人享用成本高的产品^[4]。市场机制对一般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调节是有效的,对公共性的生态环境产品的

调节能力也极为有限。生态环境产品难以象一般经济产品那样通过市场竞争进入市场;而且,生态环境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容易产生“公有地悲剧”。这就需要政府以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第四,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生态经济的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得到支付或补偿,从而产生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4]。市场不能完全捕捉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使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严重偏离;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会供给过剩和消费过度,而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却往往供给不足。对于环境问题而言,由于环境产品的外部性,使人们对环境的所作所为难以经过交易方式得以反映,环境问题就表现出某种外在于市场的效应,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容易产生。免费搭便车”(搭便车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问题,使生态环境产品生产严重不足,而外部负效应会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造成生态环境产品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又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环境资源的配置和生态产品的生产往往存在“市场失灵”。这就要求政府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替代,运用法律、政策或行政管理手段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政府介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市场在有效配置生态资源、提供生态环境产品上的失灵导致对政府行动的要求,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政府对生态经济运行的宏观干预,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不会思考,也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政府要通过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功能缺陷。

二、政府介入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依据

西部通过生态环境建设和山川秀美工程向全国提供生态公共产品,是国家区域经济分工对西部的要求,也是西部经济发展中基于比较优势的必然选

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西部市场发展程度、生态环境产品外部正效应表现滞后、生态环境建设的特性、生态建设的主体特征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与制度供给等因素,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中政府职能发挥具有广泛的现实依据。

第一,西部市场发展不足,生态资源定价和资源所有权、产权界定模糊,难以抑制生态破坏^[5]。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进行 20 余年,但目前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因此市场不完全是中国经济组织结构现阶段的最大特点,这种情况在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显得更加突出。西部生态环境产品的价格、价值、成本尚无统一的定价和界定,也没有建立起生态产品的供求机制和区域间成本补偿机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如天然草原、野生生物、地下石油资源、公共水域等公共物品的产权属于国家,但国家在西部又没有有效行使产权的机制。这容易造成经济当事人对资源的滥采滥用,致使自然资源大量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生态资源市场,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及未来市场对生态资源供求状况的不确定性等,均导致资源被低效和非法占用,最终使某些生态环境产品供求关系变形,资源枯竭,环境破坏。造成西部生态环境产品的供给,以及生态资源的侵占、滥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退化,难以通过市场调节与供求关系表现出来,导致内在成本社会化和外在化。

第二,西部生态环境产品正外部经济效果表现滞后,难以通过市场促进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西部生态环境是社会公益性很强的长期性问题,而市场机制作用在效益上具有局部性、时效性等特点。西部生态建设主体往往只注重微观经济效益,难以保证西部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同时,西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外在经济效果常常表现滞后,且难于界定和补偿,也难以用市场机制促进并增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由于局部或个体利益驱动,西部大开发可能对生态环境构成新的破坏,而市场机制则无能为力,负外部经济效果在所难免,因而生态的保护和建设问题必须靠政府的干预来解决。

第三,西部生态经济建设工程系统性与长期性^[6]。西部生态经济建设,涉及到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人口数量与质量等多种因素及其复杂组合,因而具有不同于一般经济建设的特性。这些特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初始投入的易沉淀性。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项目内容

虽多种多样,但无论项目种类和规模大小,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投资量大且不易回收,形成所谓“沉淀成本”和“退出壁垒”。由于这种较高的沉淀成本与退出壁垒的存在,使绝大多数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的工商企业组织被自然排除在生态经济建设的投资队伍之外,形成生态经济建设的私人投资供给不足。其次是效益的多样性与滞后性。与其他建设项目相比,生态经济建设项目具有效益多样性的特点。除经济效益以外,还有生态、环境和社会等方面效益,且后者的效益显著大于经济效益。

第四,生态建设主体素质低,需要政府的指挥、组织与引导。虽然西部人民群众是西部山川秀美的建设者,但西部生态建设主体从整体而言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西部落后地区政府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导,而“干部就是第一生产力”。西部生产力要素中的自然资源(劳动对象)、科技力量及科技成果(劳动手段)、人力资源(劳动者)和资金及物质条件(物质资本)等,不经过政府及干部介入形成合力时,只是潜在的生产力要素或分散的只有局部功能的低效率的生产力要素。只有通过各级政府 and 干部把它们组织凝聚集成合力,才能发生“乘数效应”,变成巨大的现实生产力。而只有各级党政干部才能担当凝聚生产力要素、把要素聚变成巨大生产力的“聚合剂,催化剂”的角色。而且在这种催化聚合生产力的过程中,干部自己也得到锤炼和洗礼,成为最宝贵的生产力要素——人力资本^[7,8]。因而,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必须依靠公共部门和政府的人力资本。

第五,基于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存在私人供给不足的基本特征,各级政府应成为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在一个特定时期,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所需要的规则是不可能依赖自发演进,而必须依赖政府的推动。在区域生态经济建设中,由政府设计制定出一系列制度具有如下作用:首先,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的真空。区域生态经济建设是一项外部性很强的事业,市场机制对此表现出力不从心,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很难使这项事业蓬勃发展起来。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以消除自由市场机制的障碍,并调动经济主体对于生态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就可以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弥补市场失灵。其次,可以降低“制度成本”。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任何制度都好于无制度,但制度的形成是有成本的。因此,比较制度的好坏,除比较两者的收益外,还需比较它们的成本。

(下转第 90 页)

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绊倒;他不是贴近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近本民族特点太紧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以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诗歌的翻译当然也不例外。追求形式对应的诗歌翻译因为极力地贴近原文,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向读者移植了异域的文化和语言,有助于丰富译入语的文化和语言表现法。然而,这样的翻译因为充斥着异化的词汇和句法,对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要求,不易为出版商和读者接受,不易流行。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东西文明交流的日益频繁,多元文化的融合大众的宽容,这样的翻译终究也会为人们接受。

参考文献:

[1]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英汉互译[M]. 上海: 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 赵毅衡. 诗神远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4]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5] 张培基.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0.
[6]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7]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8] 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9] 车明明. 论中国翻译思想史中的译者视角[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6(4): 71—74.
[10] 罗选民. 英美文学赏析教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11]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2] 董丽霞. 跨文化交际中英汉翻译技巧与实例分析[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3): 94—96.

(上接第 54 页)

对于区域生态经济建设这样复杂和长期的事业, 如果依赖“习惯—习俗—惯例—法律”这样的演进路径自发形成有效的制度, 其成本(含时间成本)相当高昂, 如果由政府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章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在自身权力范围内设计有关规章制度, 则能有效降低制度成本^[9]。

自 20 世纪以来, 无论什么体制的国家, 其政府的职能都有了很大扩张, 政府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政府行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表明, 在西部生态建设过程中更好的选择是政府在保证市场机制较好发挥对生态资源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有效介入, 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进行干预, 服务于西部生态建设和管理。不仅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 更要发挥领导和推动西部开发的一系列特殊职能; 不仅要担当宏观调控者, 同时也是主导者和直接参与者^[10],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才能重建一个山川秀美的新西部。

参考文献:

[1] [美] 吉里斯, 波金斯, 罗 默. 等. 发展经济学[M]. 黄卫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日] 青木昌彦, 奥野正宽, 冈崎哲二. 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M]. 林宏彬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3]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
[4] [美] 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第二版)[M]. 梁小民, 黄晓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5] 张安录.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职能[J]. 生态农业研究, 1996, (2): 32—35.
[6] 王朝全. 生态经济建设的特性与地方政府的作用[J]. 经济体制改革, 2004, (1): 56—59.
[7] 韦 苇. 因地制宜、辨证施治 建设山川秀美绿陕南——关于陕南三市山川秀美工程与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的调研报告[J]. 现代种业, 2004, (专辑): 7—13.
[8] 姚慧琴. 试论西部大开发中政府的特殊职能[J]. 管理世界, 2000, (5): 36—40.
[9] 周 毅, 王学伍. 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2): 11—22.
[10] 樊根耀. 环境资源的特征及其制度意蕴[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2): 26—29.